

试析日本贸易政治的决策过程和发展趋向

——以中日农产品贸易摩擦为例

归泳涛

2001年4月23日,日本正式启动了针对大葱、鲜香菇和蔺草席(榻榻米草)三种农产品的临时安全保障措施(又称临时紧急进口限制),这在日本贸易政策史上是第一次。^[1]由于三种输入品中99%来自中国,因而在事实上意味着对华贸易的歧视性政策,于是引发了中日之间在这一问题上的贸易摩擦。为了对抗日本的保护主义政策,中国于6月18日宣布对原产日本的汽车、手持和车载无线电话以及空气调节器征收特别关税。根据日方的统计,去年上述三种农产品的输入额为240亿日元,而上述三种工业品的输出额是619亿日元,它们在中日2000年的进出口总额中占不到1%。日本为什么为了这不大的一点利益而甘愿冒中国报复之险呢?这种看来并不符合日本整体贸易利益的保护主义政策是如何在日本的政治决策过程中产生的呢?本文试图以这次中日农产品贸易摩擦为例,分析日本贸易政治的决策过程,在回答上述问题的同时,指出未来日本贸易政策可能的发展趋向。

日本启动农产品临时安全保障措施的过程

从2000年8月开始,日本出现了要求发动蔬菜安全保障措施的态势。先是地方农协提出请愿要求,继而蔓延全国,逐渐演变成波及大部分地区的农政运动。运动的矛头直指农林水产省(以下简称农水省)和自民党。

农水省一开始态度消极,因为启动世贸组织规定的这项措施在日本尚无先例。而自民党却为了在2001年7月的参议院选举中保证来自农民的选票,不断向农水省施加压力,迫使农水省从11月开始着手进行调查。

要满足世贸组织规定的条件,调查立证大概需要1年时间,但来自农民和自民党的压力却容不得农水省等到调查立证完成之后再启动保障措施。为此,2000年2月,农水省一边加紧调查,一边开始了实行临时安全保障措施的准备。到3月,农水省作出了单方面发动临时保障措施的决定,并于3月23日公布了最近3年间蔬菜进口和国内生产状况的调查结果。调查数据显示,近年来从中国进口的蔬菜数量激增,但同时也显示,日本大葱的国内生产量并无明显下降,蔺草席的生产下降也与价格的变动没有必然联系,而是由高龄化带来的生产者数量减少引起的。尽管如此,农水省还是于3月28日向财务、经产两省^[2]提出了启动紧急进口限制的要求。经产省最初坚持自由贸易的原则,但逐渐软化了态度,表示只要符合世贸组织规定的条件,就可以启动该项措施。财务省则一直持慎重态度,特别针对大葱,因为进口大葱的国内市场占有率只有8.2%,不能有效地证明进口激增与价格下跌的因果关系,因此迟迟不肯表态。但是,在自民党的压力和农水省的坚决要求下,经产、财务两省最终作出妥协,在4月10日的内阁会议上,正

式通过内阁决议，决定从4月23日起启动为期200天（至11月8日）的临时安全保障措施。

在作出这项决定的前后，日本还同时进行着与中国的双边协商，但由于日本一味要求中国自主限制出口（这种做法本身违反世贸组织的规则），而中方则主张通过民间协商解决，双方立场不合，最终未能达成协议。

日本贸易政治的基本构造和决策过程

参与上述政策制定过程的，主要有农民利益集团，执政党自民党，以及中央省厅的大臣和官僚。他们各自在日本的贸易政治构造中处于什么样的位置，相互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又是怎样在这一政治过程中发挥各自的政治影响力和决策力、最终导致保护主义政策出笼的？下文将试就这些问题展开具体分析。

1. 农民和自民党

在日本社会中，农民作为一个社会集团，一直占有重要的政治地位。由于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1960年代以来，农村人口已大量减少。^[3]但是，由于农村人口构成一个稳定的选票来源，投票率相对较高，而且有很强的组织性，所以其政治影响力并未因人口的减少而受到削弱。在农民组织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被称为“农业协同组合”（简称农协或JA）的全国性农民协会。^[4]日本几乎所有的农民都通过参加农协的地方或专业组织，成为全国农协的成员。而农协在政治方面的主要责任就是通过影响政府的决策，达到保护农业生产者利益的目的。

农协发挥其政治影响力的手段主要有三种。一是通过集会等大规模农政运动，利用新闻媒体扩大自己的舆论影响，向政府施加压力。二是直接向行政机关提出请愿和要求，力图使政府制定符合他们利益的政策。三是

利用在选举中建立起来的与执政党自民党的相互依赖关系，通过选票压力迫使自民党发起政策动议，最终影响政府决策。

在农产品进口限制问题上，农协从2000年8月开始，发起了从地方到中央的一系列请愿运动。首先是传统农业县群馬县的农协向县政府和县议会提出了请愿和要求。继而千叶、奇玉等县也跟随仿效。这一态势迅速蔓延全国，到2001年1月末，来自地方的意见书已达到32个都道府县和759个市町村。^[5]

农民的请愿运动虽然引起了社会舆论的关注，却并未能直接改变农水省的态度。农水省干部一方面预测到大藏、通产两省的反对，一方面以调查立证时间不够等理由，反应消极。真正使农民的政治影响力产生效果的还是自民党。

在自民党的决策机构中，政调会居于中枢地位。政调会会长与干事长、总务会长并称“党三役”，是仅次于自民党总裁的最有影响力的政治人物之一。在政调会之下，有着12个担当部会和众多的调查会和特别委员会，它们的职能一般与政府各行政管理部门和国会的各委员会相对应，直接影响行政和立法机关的决策。那些在某一领域的部会中长期任职，具有专门知识，又拥有政治关系网的议员，被称为“族议员”，对政策制定有着极大的影响力。族议员根据专业领域的不同，又分为农林族、建设族、商工族、外交族、文教族、运输族等等，而其中，农林部会、建设部会、商工部会被称为自民党的“御三家”，它们所代表的势力是自民党巩固选票地盘、维持执政地位的关键部门。^[6]

在农产品紧急进口限制问题上，自民党，尤其是其农林族议员，生怕2001年7月的参议院选举受到影响，不得不站到农民一边向政府施加压力。在自民党综合农政调查会会长堀之内久男参加其出身地宫崎县的农民集会时，农民们声称，如果自民党仍和政府一

样继续拒绝启动紧急进口限制,就在选举中不再支持他。^[7]对族议员来说,失去选举区选民的支持无异于政治自杀,因此不断向农水省施加压力。在自民党的紧逼之下,农水省终于在2000年11月制定了调查开始的临时基准,准备接受农民的要求。

而自民党对农水省的影响力,具体来说又主要是通过中央省厅中农水大臣和农水省官僚之间的对立妥协来实现的。

2. 中央省厅间的贸易政治和决策过程

实行紧急进口限制的具体手段,是提高关税和限制进口数量。在日本的贸易决策体系中,关税的提高需要根据关税法和紧急关税等相关政令,管辖省厅是财务省,而进口数量的限制则是按照外汇法和进口管理令,属经产省所管。所以,要启动农产品紧急进口限制,必须由农水、财务、经产三省共同作出决定,并共同执行,这就需要三省之间的政策协调。同时,在一省内部,大臣和官僚也往往有着不同的立场,同样会有一番纠葛。

在农水省中,官僚们起初态度冷淡。2000年9月7日,当时的农水省经济局长石原葵在自民党农林水产物贸易对策特别委员会上说,蔬菜价格下跌的原因是气象因素使国内产量增大,启动安全保障措施的条件并不成立。^[8]

在农水省官僚上述态度的背后,有着4年前的失败经验。当时,农水省试图限制输入量激增的中国产大蒜和生姜。但是,在与大藏省、通产省协调时,却由于两省担心代偿措施和自由贸易受到损害而搁浅。结果,政府没有开始旨在启动安全保障措施的调查,而是通过两国间协商,最终由中国作出了自主出口限制的承诺而使问题告一段落。

在通产省方面,其一贯主张是,日本是受自由贸易恩惠最大的国家,因而日本自己采取违反自由贸易的举动决非良策。4年前,

通产省还拒绝了纤维业界启动安全保障措施的要求,因而在农产品问题上也态度坚决。从4年前的经验出发,这一次农水省考虑到通产省可能采取的强硬立场,一开始并不打算启动调查程序。

可以说,在最初阶段,以中央省厅干部为代表的行政官僚对决策起了主导作用。这也是日本政治多年来一直存在的一大特征,即“行政主导”。行政精英们一方面掌握着大量的专门知识和信息资源,另一方面又以自身长年的经验和业绩为骄傲,对制定正确的政策有相当的自信,不会轻易改变自己的政治判断。

然而,在日本这样的议会内阁制国家,以选举为其合法性基础的议员们,一直对这种行政官僚的一统天下心存不满。^[9]尤其当问题涉及到选票这个关系到他们根本利益的问题时,便会动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对决策施加政治影响。面临2001年7月参议院选举严峻局面的自民党,特别是其农林族议员们,为了保住在农村的传统选票地盘,决心打破行政主导的局面。自民党江藤·龟井派的一名农林干部公开声言:“一味强词夺理,为了农民的利益什么都不干的官僚主导,必须被政治主导的解决方式所取代。”^[10]在这种情势下,农水省内部的矛盾也紧张起来,主张尽早开始调查的谷洋一农水大臣和仍然坚持谨慎态度的农水官僚之间,对立日趋激烈。这场对立斗争的最终结果,可以被认为是大臣压倒了官僚,使农水省的态度发生了改变。谷洋一曾声称:“我已经压服了认为启动(安全保障措施)困难的官僚们。”^[11]

但是,大藏省关税局仍然坚持认为,表明国内农业所受损害的数据资料并不充分,拒绝开始政府调查。通产省最初也持这一态度。农水大臣压服了本省官僚,但却无法直接影响大藏、通产两省官僚们的抵抗立场。这使得开始政府调查的要求再次碰壁。

为了打破僵局,农水大臣采取了强硬手

段，越过三省之间官僚事务级的协商，直接诉诸大臣级的政治判断。为此，决定针对满足《独自检讨开始暂定基准》的6个品种，单方面向大藏、通产两省大臣提出政府调查的要求。与此同时，自民党也加紧配合、援助农水大臣，于11月24日向政府要求尽早实施面向启动进口限制的调查。

对大藏大臣、通产大臣来说，他们既是本省的行政长官，需要维护本省的独立决策能力，又是自民党政治家，为了巩固自民党主导的内阁，需要与包括农水大臣在内的其他阁僚保持协调，即使存在意见对立，也会尽量避免公开决裂。因此，他们对来自农水大臣的要求采取了既妥协又牵制的态度。在正式收到农水大臣的要求，并且在12月初第二次森喜朗内阁改造完成之后，两大臣表示同意开始政府调查。但在具体对哪些项目进行调查的问题上，大藏、通产两省认为一旦开始调查，启动限制措施的可能性很大，所以主张严格挑选。它们针对农水省要求调查的鲜香菇、大葱、西红柿、青椒、洋葱、蔺草席6个品种，提出只对其中输入量增加影响国内生产较明显的蔺草席和鲜香菇两个品种进行调查。同时认为，大葱等蔬菜的国内市场占有率很低，调查立证非常困难，从而反对对蔬菜实施调查。其实，农水省也深知对蔬菜发动限制很难符合世贸组织的规定，但由于来自农民的政治压力主要是针对蔬菜，如果在调查项目中不列入蔬菜品种，就在政治上难以交代，所以最终还是借助了自民党的政治压力，硬把大葱塞入了调查项目。2000年12月19日，新任农水大臣谷津义男发表声明，对大葱、鲜香菇、蔺草席3个品种进行政府调查，并向世贸组织作了通报。

3. 三省大臣的个人决策倾向

农水、财务、经产三省的大臣和官僚，作为政府机构的组成部分，有着各自的职能，同时由于专业领域、利益趋向的不同，对待同

一问题往往采取不同的立场。农水省当然主要倾向农民的利益；财务省的前身大藏省，曾长期居于中央各省厅的首席位置，至今仍握有重权，对国家经济、财政政策的制定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因而更多的从宏观政治、经济平衡的原则出发决定自己的立场；经产省则既主管国内经济，又主管对外贸易，主要从调整国内产业结构，维持贸易平衡的角度考虑问题。

在大臣和官僚中，作为公务员的官僚更加完全地代表本省的一贯立场，而作为议员的大臣则还要受到来自政党和选民的压力。由于大臣对本省的政策具有最终决定权，因而也就被赋予了维持或改变官僚所坚持的本省原有政策的能力。而影响大臣决策的，除了来自政党、官僚两方面的压力之外，其本人的政治背景、利害关系及从政风格等因素也不可忽视。

以这次农产品进口限制为例，在此期间先后出任农水大臣的谷洋一、谷津义男都是自民党中颇具实力的农林族议员，并且同属江藤·龟井派。这一派阀在自民党各派中位列第三，有相当大的发言权，而农业问题又是其最得意的政策领域之一。不仅上述两个大臣出自该派，而且自民党中与农业相关的部门中，该派成员出任要职也相当多，如堀之内久男（综合农政调查会会长），中川昭一（农林水产物贸易调查会会长），西川公也（农林水产部会副会长）等等。同时，他们自己所属的选举区也都是农业区，为了选票，必然要抓住这个问题为农民的利益奔走。两个大臣作为本派阀在内阁中的代表，也就必然竭力维护本派的政策倾向。

再来看财务大臣宫泽喜一。在三省大臣中，他对发动进口限制的态度最为消极，自始至终持慎重论，并希望通过两国协商解决问题。宫泽喜一是内阁中年龄最长者，当选众议员12次，大藏省出身，1967年首次入阁，历任经济企划厅长官，通产大臣，外务

大臣、内阁官房长官，大藏大臣，副首相，首相。长年主持日本内政、外交的经验，使他倾向于全面地考虑来自内外各个方面的可能反应。在2001年3月底接到农水省启动临时安全保障措施的要求后，他表示必须听取外务省以及可能成为中国报复对象的企业界及其担当省厅的意见，并且指出，如果工业产品、纺织品等也受到波及，事情就会变得很麻烦。他还再次表明了通过与中国协商，向中国提出自主出口限制的想法。^[12]宫泽喜一是1970年前后日美纺织品问题交涉中的关键人物之一，当时的最终解决办法，是日本对出口采取了自主限制。从历史上看，日本不论是在与中国还是与美国的贸易摩擦中，都有着诉诸自主限制的传统。宫泽喜一很可能从经验出发，更希望这次也通过中国方面实行自主限制来谋求解决的方案。

经产大臣的角色似乎比前两者更加重要，也更加微妙复杂。他担当着贸易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既面临国内不仅来自农产品，而且来自纺织品等一系列部门的进口限制要求，又不得不考虑实行进口限制有损日本自由贸易的形象，还会受到国外对抗措施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经产大臣平沼赳夫一方面坚持，必须严格按照世贸组织的规则决定是否启动限制措施，一方面又强调农产品的特殊性，认为应区别对待农产品和工业产品。总体上看，他采取了和经产省官僚一致的立场，即坚持自由贸易的原则，尽可能牵制保护主义势力的要求。然而，比起官僚来说，他对农水省采取了相对柔软的姿态，从而在事实上支持了农水省的要求。与财务大臣宫泽喜一不同，他在3月底的记者招待会上称，安全保障措施是被世贸组织承认的，如果符合启动条件，则不必太介意日中关系。^[13]决定他采取这种态度的，一是经产省新的政策偏好，即强调通过世贸组织规则解决争端，这不同于宫泽那样的老一代人倾向双边协商、自主限制的传统做法（关于这一点下文还将

另作分析）。二是与他个人的政治背景有关。平沼赳夫虽然本人不是农林族议员，但他所属派阀却是江藤·龟井派。正如上文所述，该派有着浓厚的农林族色彩，而且在处理中日关系上，也属于强硬派。^[14]基于这样的派阀出身，平沼赳夫在决策时会考虑到本派的立场，也是完全可以想见的。此外，平沼赳夫自己的选举区是冈山县，该县属日本农业县，而且是蔺草席的著名产地。对自身选举区利益的考虑也不能不说影响了他的政策选择。

4. 保护主义政策的抵抗力量

从进口蔬菜中直接受益，或者反过来说受进口限制损害最大的无疑是消费者。因为进口限制几乎不可避免地会带来国内价格上涨，根据日本总务省公布的5月份全国消费者物价指数，在生鲜蔬菜整体价格下降了1.8%的情况下，大葱价格却比上月上升了16.4%，鲜香菇价格上升了12.0%。^[15]来自财务省的5月份贸易统计也显示，大葱、鲜香菇和蔺草席的进口量分别比前一年同月下降了12.2%、45.9%和39.0%，而从1月到4月的进口量却是连续高于前一年同期。^[16]因此，消费者是最反对蔬菜进口限制的。但是，他们却不像农民那样构成一个有组织的社会集团，也就几乎不具有直接的政治影响力。这种权力的不平衡导致贸易政策最终反映的很可能只是一小部分人的利益要求。

除消费者之外，进口商社、流通业界以及外国食品业界也会受到进口限制的冲击。面对政府的进口限制决定，很多进口商社都坚决反对。但是，作为商社利益代表者的业界团体日本贸易会却态度慎重。该会会长宫原贤次（住友商事社长）发表谈话时说，（政府的措施）是经过充分检讨的，尽管从推进自由贸易的观点看这是遗憾的。^[17]这种态度实质上是认可了政府的决定。日本贸易会很可能受到农协的压力，尽量避免在这一问题上公开对立。

对流通业界和外国食品业界来说，他们也不具备向农协那样的强有力的组织。同时，200天的临时保障措施主要是在夏季，也即蔬菜输入和消费的淡季执行，一时尚不会明显感到价格上升带来的冲击。所以，他们虽然心存担忧，却还不能形成实质性的反对力量。

总体来说，对这次保护主义政策的抵抗相当弱。这除了以上所述原因以及涉及的贸易额很小以外，还因为农业是日本传统上受保护的产业。在“食品安全保障”、“绿地保全”等舆论的影响下，就连一般在国会反对自民党政策的在野党，也在参众两院同意了启动安全保障措施的委员会决议。尽管谁都知道临时实行进口限制从长远看并不能真正保护国内农业，但谁也不愿意站在舆论的对立面、损害自己的社会形象。

除了在野党，另一个可能的反对力量是外务省，因为贸易摩擦自然会影响到日本的对外关系。但是这一次，日本外务省在国内正面临着外交机密费等腐败问题的困扰，无力注意这一问题。而中国政府始终坚持不要让只占对日出口不到1%的3种农产品的贸易摩擦影响中日贸易的整体利益，也不要让这一问题政治化。这使得外务省没有受到来自外交方面的太大压力，因而也就没有干预这一问题的明确动力。

以上以农产品保护主义政策为例，分析了日本贸易政治中各种势力对决策的影响及其相互关系。这一政治过程可以通过下图作概略的说明。当然，这里表示的只是以农民—自民党—农水省为主线的政策过程，根据贸易问题的不同，所涉及的社会集团和占主导地位政府部门会有所不同。

日本贸易政治的发展趋向及其影响

了解日本贸易政策的决策过程，对我们

认识日本保护主义政策产生的原因，进而寻找适宜的对策，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理解这些日本国内政治的规则，还可以帮助我们预测日本的政策趋向。但这次中日贸易摩擦所反映出的，还不仅仅是上述基本的政治过程，它还反映出日本贸易政策中的一种新的战略倾向，即对世贸组织规则的运用。

1. 日本贸易政治中的法律化倾向 ——对世贸组织规则的运用

正如上文所述，以经产省、财务省为代表的自由贸易势力，与以自民党农林族和农民利益集团为代表的贸易保护主义势力，构成了日本贸易政治的基本对局。双方都利用自己所掌握的政治资源，竭力维护己方势力范围，限制对方势力的膨胀。经产省作为对外贸易的主要担当省厅，居于利益冲突的中心位置。面对来自农水省、自民党、农民利益集团以及财务、外务等其它省厅的要求，经产省的基本做法是通过运用世贸组织的规则，来抵抗其它政治势力，从而加强自身的决策能力。

这主要体现在，经产省一方面坚持世贸组织的基本精神，即贸易自由化，以强调自由贸易对日本的重要性来抑制贸易保护主义的要求；另一方面，在面临来自自民党和农民的压力不得不作出妥协时，同样以安全保障措施属于世贸组织认可的规则为出发点，既证明自己维护世贸组织精神的政策一贯性，又对保护主义施加约束，尽量使其要求不越过世贸组织允许的范围。事实证明，经产省通过这一做法，不仅有效地维护了本省在国内政治格局中的地位，而且对未来日本贸易政治的走向有着深远影响。

经产省的这一立场，使得农林族不能提出无限制的进口限制要求，并且不得和经产省一样，也诉诸世贸组织的规则。这体现出，在贸易政治中的对立双方，都以法律化的手段来追求自身的政治利益，都运用世贸

组织规则来证明自己主张的合法性，这成为日本贸易政治中新的变数。

不仅在国内政治中如此，而且在处理对外关系时，经产省也同样以世贸组织规则作为最基本的谈判武器。面对来自中国政府的反对意见及后来的报复措施，经产省不是像传统上那样主要依赖对方采取自主限制的办法，而是一直主张自己的政策符合世贸组织规则，以此寻找国际法上的根据。

日本之所以在贸易政策上发生这种转变，与其参加关贸总协定（世贸组织）以来逐渐改变贸易战略倾向有关。从1960年代到1980年代，日本在世贸组织的争端解决过程中，有13次是作为被告，而只有7次是作为原告。但自从1988年日本在与加拿大的贸易争端中首次通过世贸组织仲裁胜诉以来，日本越来越认识到世贸组织对实现自身贸易利益的价值。在1990年代，日本只有3次被作为被告，而作为原告有9次之多。^[18]这表明，日本在利用世贸组织规则规范自身贸易政策的同时，又诉诸法律化的手段，通过世贸组织反对别国的贸易政策，达到最大限度维护本国贸易利益的目的。

2. 运用世贸组织规则的界限

这种围绕世贸组织展开的贸易战略，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日本贸易政治的发展样式，使国内各种贸易势力的利益分配在新的规则下得到了安排。但是，世贸组织规则的运用决非没有界限，也远不能说取得了支配地位。在国内，政治压力依然是左右贸易政策的重要因素。就如这次蔬菜进口限制中，对大葱的限制就很难说是符合规则的，但行政当局还是被迫将大葱也列入了限制名单。从这一点上看，以经产省为代表的行政权力仍然不能利用世贸组织规则完全抵挡来自自民党的政治压力。

在国际方面，尽管在2001年初，日本就蔬菜进口问题开始了与中国的双边协商，但

从总体上看主导其政策发展的仍然是依据世贸组织规定、偏向单方面采取进口限制。这反映出日本国内保护主义势力加强了利用世贸组织规则达到自己目的的政治行动能力。遗憾的是，在对华贸易中采取这一战略显得操之过急，因为中国尚未加入世贸组织。尽管世贸组织规定，在3年内不能对安全保障措施发动报复措施，但这却暂不适用于中国。因而日本这么做，就无异于将自己置于中国报复措施的危险之下。事实的发展也证明了日本这一政策的失算。中方在给予日本重新考虑、撤回限制的一定时间后，面对日本执意坚持的态度，不得不采取了对抗措施。在这里，政治压力的因素仍然不可忽视，7月的参议院选举迫使政府急于在4月发动安全保障措施，并且不论中国的反应如何，都不可能再在选举之前作出妥协。

综上所述，在日本的贸易政治中，以有规则的贸易代替双边协商的贸易，以世贸组织规则来衡量自身和对方贸易政策的合法性，已成为一项值得瞩目的战略倾向。可以说，谁更能有效地运用世贸组织规则，谁就有可能获得更多的权力和利益。但是，贸易政治中的法律化倾向并不能改变政治过程的本质，最终在决策过程中起关键作用的依然是政治上的权力与利益之争。对国际法的运用只是改变了国内政治角逐的某些方式，使其受到国际规则的制约。

3. 日本贸易政策的转变及其对中日贸易的影响

日本政府以前不论对农产品还是其它产品，都从未诉诸世贸组织的安全保障措施，但这次却以中国的农产品为对象，首次启动该项措施，这不能不说是其贸易政策的一种转变。尽管中国尚不是世贸组织成员，但中国入世已经近在咫尺。日本对中国运用这种贸易战略，其含义也许不仅仅在于蔬菜问题上的一时得失，而是暗示着未来中国入世后的

对华贸易政策倾向。虽然这次农产品进口限制及中国的对抗措施所涉及的贸易额不到中日贸易总额的1%，但却可以被看成是未来中日贸易交涉的一块试金石。因为在日本，对发动安全保障措施的要求并不只来自这三种农产品，而是涉及其它众多农产品和工业产品，其中针对毛巾的政府调查已于4月16日开始，正在提出调查要求的有洋葱、西红柿、青椒、鳗鱼、裙带菜、木材、领带等，此外作为监视对象的还有大蒜、茄子、干香菇、合板、加糖制品等。其中不乏中国输入品占多数的品种。

随着全球贸易自由化的深入发展，日本在农产品和纺织品方面正日益受到包括中国在内的外国产品的强大压力。在农产品方面，美国和中国在对日输出中位居一、二位。2000年日本的食物进口中，美国占30.1%，中国占12.7%，远远超过其它国家。所以对日本这次采取安全保障措施，美国也很紧张，担心下一个目标就是自己。在纺织品方面，中国在对日输出中居第一位，而且呈现快速增长势头，从1996年的占53.0%持续增长到2000年的占68.1%。^[19]这些情况有可能使未来日本国内的保护主义势力进一步抬头。

目前，在世贸组织的农产品谈判中，日本已制定出一整套旨在保护国内农业的提案，例如在安全保障问题上，就要求世贸组织建立不经立证完成就可启动进口限制的新规则。这表明，日本农民社会集团的政治影响，已经超出国内政治结构的范围，进入到国际多边组织的规则制定过程中。这不能不说是近年来由世贸组织的发展所带来的贸易政治过程的新变化。面对这种变化，各派势力都会在国内贸易政治格局中，进一步利用世贸组织规则相互竞争，同时，国内政治的利益之争也会反映到对外贸易关系上，并进入多边贸易组织的领域。而如何充分、有效地运用世贸组织规则，实现自身的利益，则

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众多参与者的胜败得失。对即将入世的中国来说，面对日本的上述动向，如何在双边和多边贸易谈判中积极地运用世贸组织规则，并影响其未来的规则制定过程，将成为今后处理中日贸易关系的重要课题。

注释：

- [1] 根据关贸总协定第19条和世贸组织《关于安全保障措施的协定》，当进口的增加导致国内产业遭受重大损害或者产生这样的威胁时，可以采取必要的进口限制，但必须调查并证明客观的因果关系。这被称为“安全保障措施”，实施期限4年，最长可延至8年。在存在危机性的情况时，可在调查完成之前启动临时措施，期限为200天。
- [2] 2001年1月6日，日本中央省厅实行机构再编，原大藏省改为财务省，原通商产业省（简称通产省）改为经济产业省（简称经产省）。本文在叙述事实时，分别使用它们在当时的名称。
- [3] 日本农村人口：1960年3441万，1975年2320万，1990年1730万，1998年1155万。在此期间，农村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从37%下降到了11%。见《智慧藏》，东京：朝日新闻社。
- [4] 1992年后一般采用“JA”的名称，即Japan Agricultural Cooperatives。
- [5] [日]细谷章：《围绕启动安全保障措施的经过和课题》，载《农业与经济》，东京：2001年5月。
- [6] 关于自民党农林族对日本贸易政治的影响，参见赵全胜：《日中关系与日本的贸易政治》，东京：岩波书店，1999年版。
- [7] 《朝日新闻》2001年4月7日。
- [8] 同注[3]。
- [9] 在日本中央省厅政治中，长期存在着行政主导和政治主导之争，主要表现为公务员出身的各级官僚与议员出身的大臣、副大臣之间的权力争夺。
- [10] 同注[3]。
- [11] 《朝日新闻》2001年4月7日。
- [12] 《朝日新闻》2001年3月31日。

（下转第119页）

应,虽具有异民族文化交融历史的日本却象经济封闭在单一民族特性环境中,尽管在吸收外来文化、尤其是近代在应用欧美技术方面领先亚洲各国一步,取得了相应的成绩,但是今天却厌倦了探索适应全球化潮流的新途径的努力。将日中两国两种不同的文化融洽结合,建立一种无可厚非的全新的亚洲合作关系,这不仅对日中两国有利,对亚洲整体的发展将起到关键的作用。

注释:

- [1] 为促进国际资本的自由交易、主要以非当地居民为交易主体的(所谓的外对外交易)、在金融管制税收方面进行优惠的金融市场。
- [2] 2000年5月6日,亚洲开发银行第33届年会在泰国清迈举行。与会13国代表(日中韩加东盟10国)同意相互支持各国货币,签订了货币保护协议,称为“清迈方案”,并发表声明称“货币

互换协议将有助于更好地控制资本流动和在东亚建立一个充分协调的经济和财政监督机制”。主要内容是为了应付货币炒家狙击,避免再出现1997年泰铢被狙击后引发的金融危机,与会的东盟10国及中国、日本、韩国达成协议,在10+3的机制下建立双边货币互换机制、建立区域资本流动监控机制及增强区域抵御金融危机的能力。根据协议中的货币回购计划,各国在货币受到狙击或出现其他危机时,可以互相调换手头的货币以解急。

- [3] Digital Divide 一词首先在美国被提出来,根据字面可以翻译成“数码鸿沟”。意思是指在现代科学高速发展的情况下,能使用新技术的人和不能使用新技术的人,能利用现代技术及设备获取信息的人和不能获取信息的人之间的分裂、断层,在日本还被扩大使用为不同人所受的教育水平、收入的差异、各地区间发展速度的差异、个国家地区间的经济水平的差异等等。

(翻译:世纪津桥)

(上接第113页)

- [13] 《朝日新闻》2001年3月27日。
- [14] 江藤·龟井派首领、时任自民党政调会长的龟井静香曾强烈要求削减包括日元借款在内的对华政府开发援助。
- [15] 《朝日新闻》2001年6月29日。
- [16] 《朝日新闻》2001年6月28日。

- [17] 《朝日新闻》2001年4月18日。
- [18] Saadia M. Pekkanen, "International Law, the WTO, and Japanese State: Assessment and Implication of the New Legalized Trade Politics", in *The Journal of Japanese Studies*, Volume 27, 1, 2001 winter.
- [19] 数据来源:《通商白书2001》,日本经济产业省。